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儒家思想源遠流長，因為種種內在、外在的因素，在歷時的興衰中不斷變化與發展，到了宋代，面臨一個嶄新的環境與契機，勢必展開改頭換面的翻新與作為。即使漢唐以來儒學的發展趨向，使得宋儒偏向於對內在道德作要求，又趨於發展哲學理論性的建構，但宋朝儒者建立起一種儒者氣象，發揮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由立己而立人，施展自己的理想與抱負，他們沒有一天忘卻自己作為儒者的身分，沒有放棄過「推己及人」、經世濟民的願想，這是源自於儒家「內聖外王」精神的最佳寫照。「內聖外王」在儒家的思想裡是內外貫徹的理想，無論是對於成聖成賢的道德規範與期待，或是對於家國天下、蒼生百姓的念想與關懷，都共同存在於儒者的心中，它們彼此之間或許互有消長，互有隱顯，卻是同等的重要，總是環環相扣，彼此影響，即使到了今天，儒家文化「內聖外王」的理念情懷，也沒有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消失。

「內聖外王」一詞雖非出自儒家，但許多學者們仍以其作為儒家思想內在精神與理念的指稱，有其源流與意義，因此要研究儒家思想，便不能不明白「內聖外王」對於儒者的意義與重要性。這也提醒了我們：儒者從來不曾脫離時代背景而生存，他們的思想更離不開其心心念念所繫的家國天下。朱熹（字元晦，1130-1200 年）作為宋代的大儒，其哲學思想精深廣博，影響也至為龐大，學界對朱熹的種種研究，至今已有相當可觀的學術研究成果，但余英時在其《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曾針對目前宋代理學研究而說：

從思想史、哲學史的觀點研究宋代理學的人往往不涉及理學與政治之間的關聯。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理學內部的理論構造方面。其史學的特色則在追溯觀念的起源及其流變。因此理學怎樣上接孔、孟，中越漢儒，近承韓愈、李翱，旁涉佛、老等問題在哲學史研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若僅從取徑方面說，現代研究仍然與傳統有一脈相承之處，因為從前儒者論述「道統」的形成與傳衍也著眼於「義理」的內在發展，這一研究方式在哲學史或思想史領域內本屬於主流的地位，其正當性是不必置疑的。但以此方法施之於理學的研究卻造成了一個相當普遍的印象，即理學與理學家與當時實際政治的關係僅在若有若無之間。這一點又和常識中所理解的理學的性質有關。傳統儒家認定理學家所講求的是萬古不變的「內聖之學」，現代哲學史家也斷定理學所處理的主要是不在時空之內的種種形而上學的問題。既然如此，理學家之說自有其內在理路可循，他們與政治的牽涉無論

深淺如何，都不致對理學的建構和演進發生任何實質的影響。¹

既然是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必然無法迴避哲學內部的理論建構，通過對於這些義理的探究，發覺其真義以後，才能夠更明確地尋找到它在歷史中的脈絡。余先生並未否定這樣的研究取徑，其產生疑慮者是如此建構後產生的一種印象，那就是哲學思想內容的建構與走向似乎自成體系，自別於政治社會之外，無論理學家的政治生涯如何、當時的朝野氛圍如何，理學建構只是理學建構，它們的思想內涵呈現出來的只是「內聖之學」，外在的政治文化雖然可能使它們有所變化或領悟，卻看不到什麼實質的影響。順著這樣的印象發展，由於宋代儒者普遍偏向於「內聖」理論的建構，開創了儒家哲學思想的新高峰，相較之下，在「外王」方面的努力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即使宋儒有「內聖外王」的理想，卻看不見他們對於「外王」事業有像建構「內聖」理論如此用心，如此下去，內聖與外王儼然斷成兩截，哲學的建構與實際的政治生活也判然若分，思想與環境的割裂便可想而知了。余先生做的是史學研究，雖然目前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取徑必要且正當，在他的眼中仍不全面，因為我們的研究特重哲學思想內涵的剖析與建立，即使明白儒者的生命離不開善化家國天下的政治生活，研究成果卻顯示，我們有意無意地將政治文化的背景隔絕在外，不認為在思想與政治中間可以找到什麼實質的連結。誠然，哲學理論的建構可以自成體系，經過長期的研究發展，我們也發現宋代理學家多有宇宙論、心性論、工夫論等哲學建樹，但這對於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來說，的確只是重要的一個部份，我們還是要回到他們所處的環境、所面對的社會背景，體認那滲入他們骨髓對於「內聖外王」的堅持，才能全面的看待他們的理論建構，他們的哲學思想也才有活生生的血脈。關於宋代理學大家的朱熹研究也當如是。

余先生此研究一出，引發了不小的迴響與討論，如楊儒賓、黃進興、劉述先（1934-2016年）、陳來、葛兆光、王汎森、包弼德（Peter K. Bol）、田浩（Hoyt Tillman）、金春峰、李存山、何俊、祝平次等人，都有針對余先生此書撰寫書評或提出意見。²在眾多辯論與意見當中，筆者較為關注的，是關於「內聖外王」

¹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13~14。

² 楊儒賓：〈如果再迴轉一次「哥白尼的迴轉」——讀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當代》第195期（2003年11月），頁125~141。楊儒賓：〈我們需要更多典範的轉移——敬答余英時先生〉，《當代》第198期（2004年2月），頁97~105。黃進興：〈以序為書〉，《讀書》第9期（2003年9月），頁80~84。劉述先：〈評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九州學林》第1卷第2期（2003年），頁316~334。劉述先：〈對於余英時教授的回應〉，《九州學林》第2卷第2期（2004年），頁294~296。陳來：〈從「思想世界」到「歷史世界」——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述評〉，《二十一世紀》第79期（2003年10月），頁130~139。葛兆光：〈拆了門檻便無內無外：在政治、思想與社會史之間——讀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及相關評論〉，《當代》第198期（2004年2月），頁86~96。王汎森：〈歷史方法與歷史想像：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國學術》第18期（2004年），頁219~237。（美）田浩著、程鋼譯：〈評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世界哲學》第4期（2004年），頁103~107。（美）包弼德著、程鋼譯：〈對余英時宋代道學研究方法的一點反思〉，《世界哲學》第4期（2004年），頁92~102。金春峰：〈內聖外王的一體兩面

一詞的相關問題，包含使用與定義是否合理，或是「內聖」與「外王」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等等。祝平次便認為，「內聖外王」這對語詞是否適合用來構築宋代某些士大夫的意態，是值得商榷的。³由於余先生已說了他使用「內聖外王」一詞，是「借用傳統儒學的一個基本預設」，⁴而這個「傳統預設」在梅廣的考察中，只是近代才被學者廣泛使用，不但不是儒學的話語，更被統治者利用，成為歌頌絕對皇權的語言，不適合再被拿來論述儒家思想文化。⁵這些討論確實為我們點出此詞彙長期在使用上的模糊問題。我們在使用語言時，常是沿襲過往，沒有考察其源流，而對於同一語言意義與定位的理解也常因人而異，就像「內聖外王」一詞，是否能與「修己治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完全畫上等號，它們各自是否有定義上的些微差距，涵納的範圍又是否一致，都是相當難以分辨的。當有人使用「內聖外王」來指稱儒家的精神或理想時，雖然各人都有對於此概念不同的印象與想法，卻憑著自己的想像與理解共構成一種共識，儘管當此共識被嚴格拿來檢視時，內涵是有很多模糊地帶的。比如，「內聖外王」一詞中，包含了「內」、「外」與「聖」、「王」兩組概念，是什麼的內外，聖與王又各自代表什麼意義？其對象究竟是指君主，還是讀書人？內聖若代表個人的道德修養，外王代表實際事功，儒者對哲學建構的努力，又該屬於個人的道德修養還是實際事功？我們使用此詞彙之時，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存在著，卻從未受到進一步的釐清。

不過，筆者認為，我們的語言不斷在改變，無論一個語言概念在歷史的脈絡下有什麼樣的轉變歷程，只要我們能在自己的時代中找到其定位，在運用上約定成俗，使用方便而能傳達意義，就不必要排斥使用某個概念。語言概念本身經歷什麼轉變很重要，但我們在使用語言概念去指稱對象時，關鍵是如何能更恰當、更合理地貼近對象，描述狀態，達到順利溝通、傳達意義的功能。因此相較於某些學者認為不應再使用「內聖外王」來指稱儒家精神與理念，筆者認為，「內聖外王」這組詞語已然存在我們的研究語彙當中，不可否認的是，當我們去談論儒家追求道德修養、志在濟世的抱負時，運用「內聖外王」便能很自然傳達這樣的概念。當然，它或許確實存在著梅先生所論的「修辭魅力」，我們也能選擇另一個確實出自於儒者口中的語言來定義儒者的精神。但相對於因害怕這種語言魅力

——讀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九州學林》第2卷第4期（2004年），頁298~320。李存山：〈宋學與《宋論》——兼評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收於龐朴主編：《儒林》第1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20~259。節本收於《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2005年第2期（2005年6月），頁2~9。何俊：〈推陳出新與守先待後——從朱熹研究論余英時的儒學觀〉，《學術月刊》第38卷第7期（2006年7月），頁61~68。祝平次：〈評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學報》第19期（2007年12月），頁249~298。另尚有柯品文：〈探析宋代文化與政治史的相互建構與影響：評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東吳中文學報》第15期（2008年5月），頁165~174。楊舒雲：〈余英時的士人論及其歷史思維——以宋代「君臣同治天下」觀為切入點〉，《史原》第24期（2012年9月），頁123~166。

³ 祝平次：〈評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頁264~265。

⁴ 余英時：〈試說儒家的整體規劃——劉述先先生《回應》讀後〉，收於《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附錄三（臺北：允晨文化，2004年），頁390。

⁵ 梅廣：〈「內聖外王」考略〉，《清華學報》新4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621~667。

或歷史上的錯誤運用而放棄使用，或是重新拿一組詞彙來說明，卻又同樣要討論詞彙的定義範圍，筆者傾向直接以學界熟悉的「內聖外王」來指稱，但要注意到此詞彙在歷史中轉變、微調的過程，並以思想家本身的材料作為定義的標準，探討它被安置在宋代儒者朱熹的思想精神之中時該如何理解，盡量解決上述的種種問題，避免在使用此概念時產生過於模糊的地帶，或是缺漏了某些應該涵納的範圍，在使用也就能較為直接及準確。

基於以上的想法，筆者仍以「內聖外王」一詞作為研究時所運用的概念，並想將此詞彙放入歷史的脈絡中進行整體性的探究，探討其字源定義與轉向定義，並為朱熹「內聖外王」理念找到其傳統的薰陶根源。同時，如前所言，傳統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多半集中在理學家哲學思想的理論建構，對當時的政治社會並未細細琢磨，思想內涵與環境之間是否有實質的互動也多未著力，致使理學建構在「義理」上自成體系，卻有與儒者生存現實脫離的疑慮。余先生全力在宋代政治文化與歷史事件中建構背景，所欲呈現的是理學時代的政治環境，替哲學史、思想史補足此失落，並證明理學家從來沒有忘卻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其「內聖外王」的理念雖有矛盾的張力，卻從未兩相斷裂，理學的建構有很大的一部份是離不開政治生活脈動的。筆者同意這樣的觀察與想法，因此不得不從哲學理論的研究中探出頭來，嘗試去考察朱熹生活的時代與其政治文化⁶的氛圍，顯現宋代當朝對儒者的衝擊，以便能更貼近朱熹「內聖外王」思想的內涵。但筆者並不止步於此，而想更進一步關注由余先生的研究所開展出來的兩個問題。其一，余先生因其研究主題所限，並不聚焦在哲學思想內涵上做出處理。相對於此，為了還原理學更多思想內涵的生命，更深刻地貼近理學家的理論內涵，又要能更全面地勾勒理學的整貌，筆者雖從哲學思想中抬首，卻無意離開哲學思想上的探究，因此欲將哲學思想的理論建構，與儒者所面對的現實環境做一連結：理學家作為儒者，以讀書人之姿邁入政治殿堂，其理想抱負在家國天下，勢必受到當時的政治氛圍影響並有所妥協，也會在這樣的環境中尋求契機並努力實現儒家思想。因此一方面來說，理學家身處的政治社會與時代氛圍深深影響了他們的觀念與想法；另一方面來說，理學家又透過自己的思想理論建構企圖改變政治環境與現實社會，這兩方面形成了一種迴環反復的關係。因此，朱熹在宋代的歷史背景中，究竟產生了甚麼樣的思想，又如何透過思想展現並傳達了他「內聖外王」的理念，亦是筆者所欲研究的一大重點。通過這樣的討論，才能發掘朱熹思想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連結關係。

其二，儒者「內聖外王」的精神是不受時間空間的變遷所消磨的，即使政治現實黑暗，有諸多種種無奈，理念的實現總是不如預期，但此等精神仍存在儒者的生命之中，朱熹亦是如此。劉述先曾說：

朱子所代表的是一種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典型。他們以內聖之學為本，但

⁶ 本文使用的「政治文化」一詞，主要參考余英時的說法。見《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緒說一，〈「政治文化」釋義〉，頁 28~32。

卻有強烈的政治意識，隨時準備投入為朝廷、百姓服務。然而在實際上則崇高的理想與惡濁的現實格格不入，於是每每自覺地在朝野形成一股清流的輿論的力量，與當權的既得利益集團相對立，表現一種拒絕同流合污的態度。⁷

劉先生亦肯定朱熹所代表的儒者典型，除了以道德修養為本，亦有著淑世的服務精神，「內聖」、「外王」的思維是同時具備的，但因為理想與政治現實常常相互牴觸，朱熹等儒者被阻擋在朝廷實權之外，無法主導國家走向，卻自覺地在朝野形成一股清流，以牽制朝野內外，伺機將自己的儒家理念拓展出去。這樣的說法是相當有見地的，朱熹等人雖然無法進入政治權力的中心，卻從未放棄濟世，仍在學術教育文化方面付出相當大的心力，以期能對國家社會有所影響。從這樣的端緒往下思考，朱熹若已相當明白自己無法掌握家國政治權力的事實，而選擇積極地在政治現實之外實行自己的理念，小則塑造社會文化氛圍，大則影響國家走向，那麼必然會將心力付諸於儒學義理的講論與哲學建構中，使之散播出去以發揮力量。宋代已有許多不仕亦能行志的想法出現，如陳傅良（字君舉，1141-1203年）言：「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⁸對於不仕如何行道濟世，也有頗為一致的共識，如宋初戚綸（字仲言，944-1012年）謂：「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閭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⁹劉摯（字莘老，1030-1098年）也說：「孝順於父母兄弟，行誼信於鄉黨朋友，以為是足以盡吾職，而恂恂於名教，不知仕不仕之異。」¹⁰在鄉野間修己行德，與做官無異，一樣可以實現作為讀書人的心志與理想。可見在朱熹之時甚至更早以前，宋代讀書人雖也進入官場，但修己安人的場域已開始有了轉變的現象，也不認為進入官場才是唯一能夠行道的方式。因此所謂的「事功」、「功業」，也不再是進入官場才能夠實現，李燾（字敬子，1156-1225年）便說：「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¹¹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便曾說：「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¹²對於朱熹而言，有沒有政治的權位已不是實踐功業的唯一路途，儒者「繼往聖，開來學」更是實現濟世理念的一大事業。因此，當我們回頭看待余英時以「內聖外王」來說明朱熹、以至於當時儒者的精神理念時，會發現他主要是把儒者的道德修養與政治目的、政治背景相互聯繫，於是，似乎在宋儒的生命中，政治作為、「得君行道」或對政治的關懷等等，才是儒者實現「外王」時最有效、且幾乎是唯一的途

⁷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8月增訂再版），頁368。

⁸ 〔宋〕陳傅良：《止齋集》，《景印癸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第396冊，集部第49冊，頁411。

⁹ 〔元〕脫脫等撰：《宋史·列傳第六十五·戚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7年），第29冊，卷306，頁10107。

¹⁰ 〔宋〕劉摯：《忠肅集·潛山黃先生墓誌銘》，《四庫全書珍本·別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279冊，卷14，頁2上~2下。

¹¹ 〔元〕脫脫等撰：《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九·道學四·李燾》，第36冊，卷430，頁12785。

¹² 〔宋〕朱熹：《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2004年10月），頁22。

徑。¹³但若我們仔細考察朱熹的言論與作為，會發現朱熹雖然未能真正步入政治權力的中心，也未在此「政治領域」的外王世界中有什麼顯著的事功，但在其對於儒者定位的自我意識，在其純哲學思想的理論之中，在其竭盡心力詮解經典及從事講學的文化教育工作中，我們能夠看到他為了實現理念所做的努力與嘗試，已然超越了政治文化範圍的侷限，更開創了一條積極文教的道路，成就其嶄新的道德事功之學。因此當我們在定義朱熹的「內聖外王」理念，或以「內聖外王」來指稱其儒家精神時，理應要有更寬闊的視野，並賦予此更豐富的思想內涵。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詢問該如何在哲學思想與歷史環境二者的研究之間找出平衡的視點，欲把握它們之間的聯繫，不以義理研究取代歷史，也要能進一步描繪出思想內涵與歷史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筆者也要問，什麼樣的政治文化背景造就了朱熹的學說？朱熹又透過什麼樣的思想內涵及學術方式企圖去影響整體社會？而在此互動脈絡之間，又該如何安放「內聖外王」這樣的哲學語彙？於是，筆者欲探討的問題為以下幾點：

1. 使用「內聖外王」來指稱儒者的精神與理念時，此詞的定義、使用界定與指涉範圍為何？「內聖」與「外王」是否可以區分，如何區分，彼此關係為何？
2. 在不同的朝代與儒者間是否有特別的傾向，造成「內聖外王」型態或模式上的轉變？
3. 朱熹的「內聖外王」型態是如何的？此型態如何產生？是否前有所承，並受當代環境氛圍影響？他繼承了什麼，受了什麼影響，又發揮、改變了什麼？
4. 朱熹的「內聖外王」思想與精神，是否可從其哲學內涵中見出？其思想與環境之間的連結為何？
5. 朱熹在實踐其「內聖外王」理念時，面對政治及非政治的途徑，各有什麼樣的想法？政治與文教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否有主從或輕重之分？

基於以上的想法，本研究首先必須找到「內聖外王」一詞在儒家思想脈絡中的運用定位，確立朱熹作為儒者所承繼的「內聖外王」傳統，並看見宋朝的政治文化背景給予朱熹什麼樣的契機與限制，才能豁顯儒家自先秦至宋代始終如一的堅持，才能將朱熹的思想建構放在一個合理的時空中，使之立體起來，看見哲學思路的形塑氛圍。其次，聚焦於朱熹本身，探討其在道德與事功之間的取捨與掌握，發掘其重整過後「內聖外王」嶄新的定位與視角，並由其哲學思想中抽絲剝繭，看見他如何在哲學思維的建構中注入其內聖外王的理念，彰顯其「內聖外王」的全新意義及互動關係。最後，針對不能進入政治權力核心，卻又要實踐、貫徹其一貫的「內聖外王」精神，朱熹如何因應著時代發揮他的能力，透過經典的詮解、出版事業及教育交流作用等傳播其思想，以期達成「修己安人」的實際效用，

¹³ 余英時曾將士大夫對於地方社會的作為包括在外王裏，也用了「秩序重建」來談「內聖外王」，但受限於其研究的關注焦點與主題，仍然偏重於政治文化背景與目的，對於政治以外的部分未能有進一步的研究。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研究環節。假如能夠在「縱」的時間軸中看見其中的承接與開新，在「橫」的當代剖面中看見思想內在理路與外在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便能夠形塑一個朱熹「內聖之學」與「外王之路」的共構圖像，將其哲學思想與道德事功之學之間的互涉、交融關係展現出來，也能夠從朱熹與環境互動下所表現的儒家意識與實踐嘗試中，看見其內在的智慧。

筆者曾對朱熹哲學做出較深層的分析，除了發見朱熹之「心」的超越與能動意義外，更深切體會到朱熹是個相當實際的儒者，他不只具有內聖修為的理想，更注重現實層面的種種限制與事實，從他的理氣觀念、心統性情之說與循序漸進的工夫論之中，便能夠明白其所關懷的是天下蒼生，期望世間的人都能夠成聖成賢，並在道德的完滿中建構安居樂業的社會。朱熹的理論建構絕不脫離經世濟民的理想，不僅只是形上世界的說明與道德修養的進程，我們應該在此哲學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其對於家國天下的理念與努力，將哲學思想與歷史環境真正地連結起來，看見他如何重整與貫徹儒家「內聖外王」的理念，那麼研究的視野會更加廣闊，也能夠更深入體會儒家的精神，以期能一如過往儒者般，在學術的殿堂中，為我們的家國天下貢獻一己之力。因此本文所謂的「重整」，不僅是研究者的重整，更是研究者透過朱熹的重整而重整。本文所謂的「貫徹」，也不僅是朱熹本人的貫徹，而是欲透過發掘朱熹的貫徹，提供吾人面對學術事業時有得於己，又不私於己的智慧。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反省

如前所述，本研究從余英時對當代理學史建構中的疑慮出發，以宋代儒者中極具代表性的朱熹為研究焦點，旨在闡明朱熹對於「內聖外王」精神的重視與實踐，針對其傳統儒家思想的承繼、宋代政治與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由「內聖」學說的建構與「外王」事業的推行，去展現朱熹思想與環境之間的一體互攝關係。因此我們所要涉及的不僅只是朱熹個人哲學理論的深化研究，而是要從朱熹所繼承的儒家精神去看見他「內聖外王」的共時性與當代性，以及宋代社會與政治文化對於其思想的激化、對其落實理念的方式有什麼樣的影響，再進一步通過朱熹哲學的內涵與具體實踐看見思想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於是，關於儒家「內聖外王」的精神定向、宋明理學的發生過程、宋代政治文化（黨爭、科舉）、學術氛圍，以及朱熹哲學思想與學術研究如何因應環境以落實理念的實際情況，便與本研究之議題有實質的關聯。

本研究的討論重點有四個面相：一是「內聖外王」一詞的定義與使用問題，此中包含「內聖外王」詞彙的源流與使用疑慮、此詞彙歷時的共同性與時代的獨特性。二是宋代政治文化的現實影響，主要聚焦政治所展現的文化氛圍，以及當時儒者、士人所開展的政治意識面貌，並擴及當時的學術發展變化。三是「內聖外王」在朱熹思想中的展現，包括朱熹如何安置個人與國家、道德與事功的關係，

以及其哲學理論中細緻的印證。四是朱熹實踐其「內聖外王」理念的方式，主要是其文教事業的具體探究。因此以下便針對以上所牽涉到的文獻進行整理說明。

一、「內聖外王」一詞之使用與討論

「內聖外王」概念有其起源與發展過程，針對其歸屬儒道或字源意義的問題，已有許多研究。比如吳震〈「內聖外王」的一種新詮釋——就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而談〉、陳仁仁〈莊子「內聖外王」思想的三種形態〉認為「內聖外王」是天下的學問，不專屬任一諸子百家；程潮《儒家內聖外王之道通論》指出蘇軾、焦竑等人將「內聖外王」視為儒家之道；朱義祿《儒家理想人格與中國文化》認為「內聖外王」是介於儒家和老莊之間的。¹⁴多數研究者都認為，「內聖外王」的原意是針對身為「聖王」的統治者而談的，基本意義是「內修聖德，外行王政」，如李進〈「內聖外王之道」的衍化〉、柴文華〈內聖修補新外王——對現代新儒家內聖開出新外王的省思〉。¹⁵而關於早期「聖」、「王」的定義，郭沫若、羅振玉、商承祚的考古文字學研究已可供參考，相關討論也包含林世賢〈聰聖、聞思與音樂——論耳修在工夫論上之殊勝〉、成雲雷《先秦儒家聖人與社會秩序建構》等研究。¹⁶

至於較集中於儒家「內聖外王」的使用與討論，專書有熊十力（1885-1968年）《讀經示要》、《十力語要》、徐復觀（1904-1982年）《學術與政治之間》、牟宗三（1909-1995年）《政道與治道》、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程潮《儒家內聖外王之道通論》、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朱義祿《儒家理想人格與中國文化》、鄭臣：《內聖外王之道：實踐哲學視域內的二程》；論文集有劉述先等《當代新儒學論文集》；學位論文有彭孝維《先秦儒家「內聖外王」思想之研究》、林翠芬《孟子內聖外王思想之研究》、陳政揚：《孟子與莊子「內聖外王」研究》；單篇論文有黃俊傑〈內聖與外王——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祝平次〈評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

¹⁴ 吳震：〈「內聖外王」的一種新詮釋——就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而談〉，《國學學刊》第2期（2010年6月），頁76。陳仁仁：〈莊子「內聖外王」思想的三種形態〉，《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期（2011年），頁18。程潮：《儒家內聖外王之道通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0~13。朱義祿：《儒家理想人格與中國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4。

¹⁵ 李進：〈「內聖外王之道」的衍化〉，《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2期（2010年3月），頁39。柴文華：〈內聖修補新外王——對現代新儒家內聖開出新外王的省思〉，收於劉澤華、羅宗強主編：《中國思想與社會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351。

¹⁶ 郭沫若：《卜辭通纂》第615片，收於許鈺輝主編：《民國時期語言文字學叢書》（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09年），第一編5，頁437。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殷中》，收於許鈺輝主編：《民國時期語言文字學叢書》，第一編1，頁85~86。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下篇》，收於許鈺輝主編：《民國時期語言文字學叢書》，第一編6，頁240~241。林世賢：〈聰聖、聞思與音樂——論耳修在工夫論上之殊勝〉，《漢學研究》第30卷第1期（2012年3月），頁61~92。成雲雷：《先秦儒家聖人與社會秩序建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22。

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吳震〈「內聖外王」的一種新詮釋——就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而談》、梅廣〈「內聖外王」考略〉、楊澤波〈內聖外王之辨及其當代價值——對一個學術公案的遲到解讀〉等。¹⁷

儒家思想的精神以「內聖外王」的統一與貫徹為趨向，此一見解早期在學界有高度共識。徐復觀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一文中言：

儒家思想是以人類自身之力來解決人類自身問題為起點，所以儒家所提出的問題，總是『修己』、『治人』的問題。而修己治人，在儒家是看作一件事情的兩面，即是所謂一件事情的「終始」、「本末」，因之儒家治人必本之修己，而修己亦必歸結於治人，內聖與外王是一事的表裡。¹⁸

「修己治人」即是「內聖外王」之事，通過對於自我品德的涵養達到「內聖」，進而能夠以德治理天下，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而「外王」。「內聖」、「外王」雖有本末始終，卻只是一體的兩面，不「修己」無法以德「治人」，只「修己」而不「治人」也不是修養的完成，兩者迴環往復，是不能夠分開的。李澤厚也說：「首領、貴族們的個體『內聖』本是與其能否成功地維繫氏族團體的生存秩序的『外王』，相緊密聯繫在一起的。」¹⁹儒家思想以「內聖外王」的連續作為精神定向，是相當適切的說明，「內聖」、「外王」二者緊緊相繫，也是歷來學者們認知且肯定的關係。但由於先秦儒者雖有這樣的精神傾向，卻沒有明確規範「內聖外王」之間的指涉關係，因此李澤厚認為在孔子之後，「內聖」和「外王」便分開變成兩個議題，後代多有偏重於「內聖」或「外王」的傾向，而宋代對於「內聖」的關注大大則是壓過了對於「外王」的重視，如牟宗三所言：

宋明儒學傾向「內聖」這一面，而「內聖」理想落實在個人身上；「外王」理想反而落實在政治領域上，但是，宋明理學在這方面做的工夫「不夠」，

¹⁷ 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廣文書局，1984年）。熊十力：《十力語要》（臺北：廣文書局，1989年）。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鄭臣：《內聖外王之道：實踐哲學視域內的二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劉述先等著：《當代新儒學論文集外王篇》（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彭孝維：《先秦儒家「內聖外王」思想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1991年）。林翠芬：《孟子內聖外王思想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碩士論文，1991年）。陳政揚：《孟子與莊子「內聖外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黃俊傑：〈內聖與外王——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收於黃俊傑、劉岱主編：《天道與人道》（臺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頁243~283。祝平次：〈評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學報》第19期（2007年12月），頁264~265。吳震：〈「內聖外王」的一種新詮釋——就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而談〉，頁76~85。楊澤波：〈內聖外王之辨及其當代價值——對一個學術公案的遲到解讀〉，《河北學刊》第32卷第4期（2012年7月），頁23~29。

¹⁸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頁8。

¹⁹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頁257。

導致新儒家提出「新外王」之另類理論框架來彌補傳統儒學的缺陷。²⁰

牟先生認為宋明儒學的發展傾向於「內聖」，也就是對個人修養的完善要求，而關於政治領域的「外王」方面，就顯得有所不足。仔細思索之，宋明儒學在「內聖之學」方面的建構相當豐富，使儒家思想有了顯著的成果，對於國家的治理方面卻少有建樹，也並未使人君完滿德行，施展仁德於家國百姓；宋明儒者對於形上思想的理論相當感興趣，多朝天道性命心性上探究，也注重個人修養的工夫，相對於政治方面的理論而言，確實是壓倒性的大勝，牟先生此論是有其根據在的。這樣的看法影響了部分研究，學界隱隱然瀰漫著一股印象，也就是宋代儒學的發展以「內聖」多於「外王」，進而言之，無論理學家如何強調「內聖外王」的一貫，但卻多致力於哲學思想的發展，「內聖」學說儼然獨立於「外王」理想而存在，他們對於「外王」是否有所堅持與貢獻已不是重點，因為這些不影響其「內聖」學說的發展與研究，連帶著理學家所處的政治世界也與思想之間斷裂開來，沒有實質上的關聯。

前已有言，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指出了目前哲學史、思想史研究存在著這樣的傾向，認為這是有所偏狹的，其言：

在一般哲學史或理學史的論述中，我們通常祇看到關於心、性、理、氣等等觀念的分析與解說。至於道學家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活動，則哲學史家往往置之不論，即使在涉及他們的生平時也是如此……但這一現代觀點在有意無意之間也造成了一個相當普遍的印象，即儒學進入南宋以後便轉而向內了。用傳統的語言說，南宋儒學的重點在「內聖」而不在「外王」。此中關鍵在於理學是不是可以概括南宋儒學的全部？……他們對儒學的不朽貢獻雖然毫無疑問是在「內聖」方面，但是他們生前念茲在茲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實現。更重要的，他們轉向「內聖」主要是為「外王」的實現作準備的，因此他們深信「外王」首先必須建立在「內聖」的基礎之上。²¹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即使宋代理學家在「內聖」學說上大放異彩，遠遠勝過對於「外王」理想的實踐，卻不代表理學家忽略了「外王」的實現，或是把「內聖外王」割裂開來，使哲學思想的建構脫離政治文化的背景，反之，「內聖外王」的連續關係，在儒家的思想中從未改變，對於宋代儒者亦是如此，「外王」事業的蕭條，正反映了當代環境給予儒者的影響，而此理想則是透過「內聖」學說的建立去貫徹的，從這個角度看來，「外王」理想的落實才有了積極的意義。余先生全書致力在討論朱熹的歷史世界，嘗試梳理理學與宋代政治文化的關係，其中著重的是重建宋代士大夫的整體意識、當時的政治氛圍，特別是在國是與黨爭的

²⁰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 10~11。

²¹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頁 22。

部份做了詳細的考察，把儒者實現外王理想的政治場域描繪出來，並進一步呈現了理學家在權力與君主間的交涉過程，使得宋代儒者的「外王」理念與努力一展無遺，可說是打破了宋代儒者不重「外王」的迷思。

余先生為宋代儒者由「內聖」通「外王」的堅持做了最好的注腳，這是無庸置疑的，但他處理的多半是歷史問題，從環境背景來呈現宋代儒者的道德意識與政治生活樣態，但限於問題意識與研究走向，他對於「內聖外王」的儒學傳統並未做出處理，在朱熹思想內涵與「外王」理念的落實關係上、與環境的互動上，也說明得有限，只在其理氣論、君道思想以及「得君行道」部份有所碰觸，²²這與其重在史學研究也有關係。由於余先生未多加發揮的這兩部份正是筆者欲處理的區塊，故仍需進一步考察此方面的研究。

關於儒家「內聖外王」源流與定義的研究，海內外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如黃俊傑在〈內聖與外王——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一文中，對先秦至南宋儒家思想中「道德」與「政治」的關係做了觀察，已明確指出儒家「內聖外王」緊密的關係，其曰：

從思想史上所表現的事實來看，我們可以說，中國儒學傳統未嘗離事而言理，儒家常把屬於「內聖」範疇的知識與德行的問題置於「外王」(即「用」、即權力的運作)的脈絡中來反省。……儒者要使他們的信念「見諸行事」，則必須把「知識」與「道德」和「權力」三者緊密接隼始有可能。因此之故，「知識」、「道德」和「政治」在儒學傳統中就緊密地結合為一。而由這種結合之中也具體地反映出儒學的根本特質在於成己成物不二、體用不二、內聖外王不二。²³

黃先生認為在儒學傳統中，「知識」、「道德」和「政治」是連貫不分的，「內聖」與「外王」、「德」與「位」(勢)是緊密相關的，儒者一方面要求道德人格的養成，一方面也要求實際落實在政治層面，以平治天下為最終目的。他也進一步考察了先秦至南宋「道德」和「政治」之間的消長關係與轉折關鍵，也看到儒家秉持「內聖外王」理念面對現實時的矛盾衝突與共生關係，對於朱熹進《四書》退《五經》的意義亦有所注意。黃先生的文章主要是做一思想上的變遷探討，對於未明確地分析「內聖外王」的不同涵義與指涉對象，也並未針對政治情勢、文化氛圍做深入的討論，是本文可以再發揮的地方。另又有程潮〈儒家「內聖外王」的源流及內涵新探〉、梅廣〈「內聖外王」考略〉等期刊論文論述，針對「內聖外王」的起源與流變做了整合的交代。如程潮對儒家「內聖外王」的涵義則區分為三：成己成物(人格意義)、修己治人(政治意義)、明體達用(學術意義)，將「內聖外王」多元的層次展現出來。梅廣則指出近代以來學者使用「內聖外王」

²² 見余英時：〈朱熹的「君道」及其理學結構〉(《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緒說之五〉，頁238~251)，〈「得君行道」——朱熹與陸九淵〉(下冊第八章，頁54~80)。

²³ 黃俊傑：〈內聖與外王——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頁249~250。

一詞的問題，對「內聖外王」做出溯源式的考察，並認為不應再使用「內聖外王」來指稱宋代儒者以至於整體儒家的理念與精神。

統整以上研究可知，關於儒者「內聖外王」的討論，前期強調「內聖外王」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精神，「內聖」與「外王」是一貫的，但宋儒有偏向於「內聖」的傾向。余英時先生的研究則認為，宋儒在實現「外王」理念的政治場域中，仍有積極的意識與作為，且更多透過「內聖」來達到「外王」的落實，打破以往宋儒「內聖」多於「外王」的印象。而因余先生的研究引發了更多人重視「內聖外王」的問題，近幾年來針對「內聖外王」一詞的討論漸漸增加，也開啟討論「內聖外王」一詞是否適用、或二者關係是否連續等問題。而針對個別人物與時代的「內聖外王」考察，由於研究者談論的多半是儒家自先秦孔孟荀時代所展現的「內聖外王」思想，以至目前學界所認識的「內聖外王」意義，進而統言「內聖外王」的界定與定義，不但缺乏先秦之後諸如漢唐的討論，也少在時代變遷中看到，雖然在不同時空下「內聖外王」的精神價值一致，但對象與意涵寬窄都應有不同的轉化與指涉。先秦儒的傳統是什麼，漢唐儒的變化是什麼，宋代儒者又有什麼自己的特色，這些差異都在細微之中，若只是概化籠統言之，只是思想上的統攝，無法呈現先秦以至宋儒「內聖外王」精神與現實環境的互動關係。另外，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中深切地討論到儒學無法真正實現的幾項因素，除了帝王意志的制約，也特別強調了儒者內部的參差，以及政治爭奪的後果，提供我們看待儒家「內聖外王」理想實踐的難度與悲劇性質更多的思考面向。²⁴

除了「內聖外王」的早期定義與衍伸界定問題，本文為建構朱熹之前儒家「內聖外王」的發展脈絡，探討從先秦到漢唐時代，儒者與時代背景互動下的傳統資源與表現特色，聚焦在與儒者思想與意識較為相關的部分進行取材，關於儒者思維部分多半回歸原典，以避免繁複與不夠集中。但本文仍借助、參考學界對於歷史的研究，以及部分說明儒學發展情況的看法。比如陳瑛主編之《中國古代道德生活史》對漢、唐時期君臣中的政治道德與互動情況有所說明；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指出漢代對於教化相當重視，反映在各級學校的建立，與地方官員對於教化工作的參與，更舉出漢代選官制度與儒家知識份子仕宦之途與政治、治世之間的緊密連結；李軍《士權與君權：上古漢魏六朝政治權力分析》與劉澤華、葛荃主編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訂本）》中，指出魏晉南北朝郭象的「內聖外王」思維，已非儒家型態；程方平《隋唐五代的儒學——前理學教育思想研究》詳細說明了隋唐時期的經學與考試制度，包含了帝王對經學的態度、進士科對治經入仕的影響、儒家知識份子要求科舉及考科的改良、對於經書本身的反省等等。²⁵關於歷史的研究繁不及載，但以上這些研究較為切中本文所論議題，

²⁴ 見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

²⁵ 陳瑛主編：《中國古代道德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161~163、250~254。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37~339、448。李軍：《士權與君權：上古漢魏六朝政治權力分析》（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12~218。劉澤華、葛荃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訂本）》（天津：開南大學出版社，

標舉出與儒者相關的君臣關係、考試與仕宦、儒學教育之情況，對本文之歷史背景建構、儒者與環境的互動呈顯有所助益，故為筆者所借鏡。

二、宋代儒學發生與政治文化背景、制度脈絡、學術氛圍

關於宋代的儒學的發生過程與政治文化背景，不包含專門治史的研究，而是與儒學有較直接相關討論的，專書有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勞思光（1927-2012 年）《中國哲學史新編（三上）》、楊渭生《宋代文化新觀察》、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學位論文有林漢文《士論與道理：試由宋代士人政治之發展解釋理學的興起脈絡》；單篇論文有陳俊民〈「道學、政術」之間——論宋代道學之原型及其真精神〉；日本研究有諸橋轍次《儒學之目的與宋儒慶曆至慶元百六十年間之活動》、土田健次《道學之形成》等。²⁶

多數哲學史專書都指出宋代儒學是因應著思想內部的需求與外部社會的激化應運而生的，如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中以唐末思想之趨勢（佛道二教的刺激與儒學復興嘗試）作為內部原因，以宋代皇室對文人的重視、群眾的冀望心理、面對外族侵擾的救亡意識、文人自身的責任感做為外部原因；²⁷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中則將宋代理學的興起歸因為三方面：漢唐儒生「破碎大義」的章句訓詁之學、佛道二教的「異端邪說」、「文以害道」的四六美文。²⁸以上在儒學發生的討論上雖對歷史環境略有提及，相對於思想內部需求的討論卻是遠遠不及，如同日本學者土田健次郎所說：「中國社會極具政治性，政治與社會對思想的約束力甚強。但是，在敘述中國思想史的時候，除了王朝的興亡、交替之外，政治性、社會性的事象經常被忽略，此種敘述傳統至今依然根深蒂固。」²⁹這裡點出了宋明理學史的發展記敘經常性地忽略歷史政治的環節，這與余英時的觀點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但土田氏並未真正涉及歷史的環境考察，只在讀書人的言論中進行討論。楊渭生在《宋代文化新觀察》一書中，針對宋代的文化發展形勢有較為廣泛的討論，包括宋朝的文治政策、對科舉的改革、注重典籍與讀

2001 年 6 月第 2 版），頁 311~313。程方平：《隋唐五代的儒學——前理學教育思想研究》（雲南：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86~90、207~211、217、224。

²⁶ 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勞思光：《中國哲學史新編（三上）》（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楊渭生：《宋代文化新觀察》（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年）。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林漢文：《士論與道理：試由宋代士人政治之發展解釋理學的興起脈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陳俊民：〈「道學、政術」之間——論宋代道學之原型及其真精神〉，《哲學與文化》第 29 卷第 5 期（2002 年 5 月），頁 409~425、485~486。（日）諸橋轍次：《儒學之目的與宋儒慶曆至慶元百六十年間之活動》（南京：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1937 年）。（日）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道學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²⁷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新編（三上）》，頁 15~37、70~72。

²⁸ 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頁 14~15。

²⁹ （日）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道學之形成》，頁 1。

書，指出新儒學發展的社會環境正因應了政治需求、社會的變動與文化教育的風尚，是值得參考的研究方向，但由於文章眼光放在宋代的整體文化，包含宗教、史地、娛樂、科技、外交，故於思想及環境的互動關係上未有更詳細的討論。陳俊民〈「道學、政術」之間——論宋代道學之原型及其真精神〉認為濂關洛閩五子創立了一道學體系，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衝突中尋求調和，文中說明元祐、慶元「道難」是學、政衝突尖銳化的表現，注意到學術思想與政治事件之間的關係，並認為雖然理學相當程度地哲學化，卻從未改變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積極進取的政治抱負與現實性格，可謂注意到宋代理學家貫徹「內聖外王」的真精神。

由此可知，要全面地談論宋代儒學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注意到政治環境與其所塑造的文化，余英時便對其時「國是」的出現所引發的士大夫黨爭進行論述，把宋代士人的政治地位、契機與限制做了很清楚的討論，認為宋代君主對於士人相當尊敬，不斬殺讀書人，儒者又以道自任，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要求與君主「共治天下」，於是才有「國是」的出現，這樣的機會使得儒者結黨，爭相進入權力中心，期望自我理念的落實。³⁰針對「國是」，余先生認為，「不通過『國是』便無法徹底認識朱熹的歷史世界……但據我瀏覽所及，這個重要的政治現象，尚未見有人做過系統的討論。」³¹因此，他便針對兩宋的「國是」變遷進行考證，史料使用豐富，確實呈現了當時「國是」支配影響讀書人與政治走向的現實；又通過「國是」看待複雜的「黨爭」問題，使得宋代的政治情勢有了清楚的表述。³²由於余先生不是研究思想的學者，自然著重在歷史的陳述，此政治文化的背景研究提供我們極豐富的資訊，對於理解宋代儒者為實現「內聖外王」理念與現實環境的互動軌跡與方式侷限頗有助益。陳榮照《范仲淹研究》針對范仲淹的變法始末進行說明；湯承葉《范仲淹研究》則指出，范仲淹新政企圖以學術推動政治、振士氣、開風氣的主張，可證儒者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何忠禮《宋代政治史》中分析范仲淹與王安石變法與新政過程，也歸結新政失敗的原因。³³羅家祥則於《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一書中，針對北宋的黨爭有一較詳細的考察，認為北宋政治的朋黨在苟安與改革中產生，又通過台諫與統治者厭惡朋黨的心理激化起來，可看見當時黨爭與政治之間混亂的交涉關係，此考察可輔助我們對宋代黨爭與政治情勢有更深入的了解。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則詳細說明了南宋長期的政治與黨爭狀況，並認為黨爭是南宋文人參政的主要表現形態，並決定了當時文人的文化表現與性格，為理解南宋的政治情形提供了完整的分析，但書中後半主要以文學變化作為書寫主體，對於當時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並未觸及，儒學與政治的關係討論得較為薄弱。

³⁰ 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第五章〈「國是」考〉，頁340~387。

³¹ 同上註，頁340。

³² 見同上註第五章與第七章，頁340~387、424~510。

³³ 陳榮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7年）。湯承葉：《范仲淹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輯委員會，1977年），頁255~272、241~302。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46~158、171~204。

另外，與政治社會相關的一個議題，是所謂的科舉制度。關於宋代科舉與社會的研究，專書有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賈志揚《宋代科舉》、劉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吳錚強《科舉理學化——均田制崩潰以來的軍民整合》、馮用軍《多學科視野的科舉學研究——大規模考試視角》；海外研究有 Peter K. Bol《歷史上的理學》等。³⁴

宋代科舉給予讀書人一個晉升官場的機會，也就提供了他們實踐理念的路徑，科舉考試所要求的考試定本、科目與範圍都影響了士子的所學與未來官員的人才類型與人格特質。關於宋代的科舉制度，何忠禮對於宋代的科舉考試有所討論，但只概略性地提到科舉與宋學的發展關係，未明確地將科舉與讀書人思想的轉變之間聯繫起來。Peter K. Bol 於《歷史上的理學》一書中以政治、社會、文化之間的實際互動關係作為進路，對於唐宋之際的科舉制度與轉變有所討論，注意到經典的義理詮釋、作文的書寫、文章內涵的要求對於科舉制度的革新，³⁵可見當時儒家以「德」為取士標準，注重對於「道」的維護與追求，企圖轉變學風與選考制度的樣態。劉海峰則對中國科舉的發展變化有所考察，也注意到科舉與教育的緊密連結，針對宋代學校與書院而有討論，指出教育與考試制度之間的相依相存關係。李弘祺也考察了宋代科舉與教育的體制，指出宋代知識份子在教育與科舉間的兩難，一方面要求教育為科舉作準備，一方面也反對科舉對教育的限制，但無論如何，都可以看出科舉人才是透過教育而培養的，而通過科舉才有入仕的可能，因此教育就成了儒者實現理念的一大致力環節；通過教育，讀書人的思想才能有所轉變，進而才能影響治國者與人民社會，因此宋代特別的書院制度便成了理學家實行抱負的勝場，也由「書院官學化」的過程展現出理學家爭取學術領導地位的努力。³⁶馮用軍《多學科視野的科舉學研究——大規模考試視角》中，特別地提到了科舉制度與中國哲學之間的聯繫，認為中國科舉以儒家哲學作為基礎，除了考試範圍與內容是儒家經典，其制度的目標與精神也以儒家「內聖外王」為標準；科舉制度也深深影響中國哲學，比如篩選的人才服膺於儒家思想，讀書人學習了儒家義理作為考試的依據，也透過科舉促進了哲學的創新與發展變化。³⁷由此探討中可以發現科舉與宋代儒者是相依相存的，科舉影響了讀書人，讀書人

³⁴ 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劉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漢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吳錚強：《科舉理學化——均田制崩潰以來的軍民整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馮用軍：《多學科視野的科舉學研究——大規模考試視角》（雲南：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美）Peter K. Bol 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

³⁵ 見（美）Peter K. Bol 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頁 40~51。

³⁶ 見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 308~311。

³⁷ 見馮用軍：《多學科視野的科舉學研究——大規模考試視角》，第三章。

也由此影響科舉，進而影響政治社會及國家走向，這對我們探討朱熹「內聖外王」的思想與實踐是有所啟發的。

至於宋代學術狀況與發展傾向，在范立舟《理學的產生及其歷史命運》一書中，說明了北宋時期經學與文學的發展狀況，也指出北宋時期許多人對於理學說法的不滿，呈現當時關注議題是如何將學術應用到實際的政治社會之中。吳國武《經術與性理——北宋儒學轉型考論》指出北宋儒臣引經治政，以經典指導國家的思維與做法，顯現儒者將經典學術運用到現實政治之上的風氣；他也提到至北宋中後期，經學的理學化情形益發明確，揭露理學精神對於學術的影響，以及儒者對於治經看法正在逐步轉變的傾向。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中論述了北宋中期經學、文學、史學的發展狀況與特色，也指出宋代前後期學術逐漸向道德義理靠攏的情形。羅炳良〈宋代義理史學再評價〉一文則指出，宋代史學出現理學化現象。³⁸這些研究協助筆者建構朱熹時代學術氛圍的大體發展與傾向，刻畫出北宋與南宋的不同，以及各個領域朝向強調理學思維、說理議論的整體脈絡，此過程並非是理學家單獨的推倡所造成，而關涉著宋代儒者們關注焦點與關懷意識的逐步轉變，此歷史環境的具體氛圍，對於朱熹以至南宋理學家重視向內求索的原因可有所啟發。

三、朱熹的哲學與「內聖外王」理念關係與實踐

關於朱熹哲學理論與「修己安人」連續精神的互動關係，歷來研究不多，多數是點到為止，與學術界聚焦於心性理氣的哲學義理研究有關，如當代新儒家學者唐君毅（1909-1978 年）、牟宗三的研究，當然從這些討論中可以擷取出關於朱熹如何談論內外、體用、本末的看法，但將之與朱熹「內聖外王」型態連結的頗為缺乏。李幸玲〈略論先秦兩漢的「本末」觀〉說明了早期「本末」概念的指涉與關係，提供我們掌握朱熹「本末」概念的傳統根據；胡元玲〈宋代理學體用論探討〉論述了中國「體用」觀的發展過程，指出到了宋代「體用」概念的廣泛、靈活使用，為朱熹「本末」概念奠基；許滄《全體大用：朱子道學之基本構成方式》，指出體用概念伴隨著南北朝形神關係的討論，而成為一組明確的概念，並專用於本體方面的問題，更認為朱熹經常以體用概念解經、闡發義理，將體用視為一種哲學方法或思維方式。³⁹

³⁸ 范立舟：《理學的產生及其歷史命運》（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7~34、65~76、164~168。吳國武：《經術與性理——北宋儒學轉型考論》（北京：學苑出版社），頁 33~39、59~64。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頁 19~20、61~86、106~112、117~120。羅炳良：〈宋代義理史學再評價〉，收於鄧小南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04~519。

³⁹ 李幸玲：〈略論先秦兩漢的「本末」觀〉，《中國學術年刊》第 20 期（1993 年 3 月），頁 173~212。胡元玲：〈宋代理學體用論探討〉，《中國文化月刊》第 263 期（2002 年 2 月），頁 18~37。許滄：《全體大用：朱子道學之基本構成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而關於朱熹「內聖外王」的討論，可重探其對道德與事功關係的看法，此部分牽涉到與陳亮（字同甫，1143-1194 年）爭論義利的問題，相關研究如專書有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吳春山《陳同甫的思想》、田浩《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學位論文有林海霞〈醇儒與英雄——朱熹陳亮辯論研究〉；論文集論文有黃開國〈陳亮重事功的功利思想〉、陳立驤〈朱子與陳亮的歷史評論——以「漢唐之爭」為中心的探討〉；單篇論文有簡貴雀〈陳亮與朱熹之辨論〉、鄭吉雄〈陳亮的事功之學〉、葉世昌、馬新愛〈陳亮主張「義利雙行」說質疑——兼論陳亮、朱熹在義利觀上的分歧〉、鄭伊庭〈「成人」與「醇儒」——論陳、朱之辯中儒學理想的分歧〉、李美惠〈陳亮主張「義利雙行」之商榷〉等。⁴⁰這些研究基本上已能看出陳亮與朱熹在義利之辯上立場並不衝突，陳亮主「事功」，卻不反對「道德」，朱熹主「道德」，也不反對「事功」。而筆者認為，陳亮與朱熹的討論，不僅只停留在「義利」、「王霸」的問題，而涉及了「內聖外王」的層次，從這樣的端緒，可以重新定位朱熹的「事功」，是怎麼樣的一個內涵，幫助我們重新發見朱熹新的「外王」範疇。可惜諸多研究多環繞在義利王霸及漢唐評價之中，並未延伸至「內聖外王」層次進行討論。另外如前所述，余英時於朱熹的思想內涵部份涉獵不多，只在其理氣論、君道思想以及「得君行道」部份有所簡略處理，而朱熹的哲學理論基調中，有許多反映出其內外、物我關係的部分，是我們可以加以發揮的地方。

朱熹在文教事業上的實踐，包含了多種面相。有關經典詮釋與朱熹《四書》學的先行研究眾多，包括陸建猷《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陳志信《朱熹經學志業的形成與實踐》、〈論《四書章句集注》對聖賢授受語境的承繼與開展〉。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陳逢源〈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林維杰《朱熹與經典詮釋》、朱漢民、肖永明《宋代《四書》學與理學》；論文集有李明輝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二）儒學篇》、《儒家經典詮釋方法》；學位論

⁴⁰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 年），第 5 冊。吳春山：《陳同甫的思想》，《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1 年），第 35 冊。（美）田浩：《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根據哈佛大學出版社 1982 年版譯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年。）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林海霞：〈醇儒與英雄——朱熹陳亮辯論研究〉（江蘇：蘇州大學中國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黃開國：〈陳亮重事功的功利思想〉、陳立驤：〈朱子與陳亮的歷史評論——以「漢唐之爭」為中心的探討〉兩篇，皆收於盧敦基、陳承革主編：《陳亮研究：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2 月）。簡貴雀：〈陳亮與朱熹之辨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1984 年 6 月），頁 407~538。鄭吉雄：〈陳亮的事功之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6 期（1994 年 6 月），頁 257~289。葉世昌、馬新愛：〈陳亮主張「義利雙行」說質疑——兼論陳亮、朱熹在義利觀上的分歧〉，《孔孟月刊》第 35 卷第 8 期（1997 年 4 月），頁 28~31。鄭伊庭：〈「成人」與「醇儒」——論陳、朱之辯中儒學理想的分歧〉，《有鳳初鳴年刊》第 5 期（2009 年 10 月），頁 395~398。李美惠：〈陳亮主張「義利雙行」之商榷〉，《崇右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2010 年 5 月），頁 209~228。

文有高荻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解經研究》、柯玫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研究——以詮釋傳意方法分析》等。⁴¹

朱熹對經典的詮釋，傾注了極大的心力，陸建猷《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的第二章與第四章，討論了《四書》在宋代的興起與地位抬升的狀況，也討論了朱熹選擇《四書》作為經典詮釋的原因，以及其與南宋《四書》的發展關係。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的第五章〈朱熹的「四書」學〉，討論了朱熹《四書》學的發生與內涵，以及朱熹以《四書》推展道統、兼顧義理與訓詁的詮釋方式。陳逢源對朱熹的《四書》學進行全方面的研究，從其價值到與歷史環境的互動，包含〈四書集注〉的起源、編次、詮釋方法、格式、內容、義理，再擴及孔孟、二程、湖湘的繼承與改變，可謂深入而精到，其中關於道統傳承、為學次第以及政治的訴求觀點，對於筆者有頗大啟發。陳志信《朱熹經學志業的形成與實踐》一書中說明了朱熹對於經學的體會與重視，討論他如何在學術之中選擇經學作為志業的發展過程，並指出注經解經對於朱熹的意義遠勝於從政，是傳道、教育、經世濟民的具體作為。對於「內聖外王」思想有最直接討論的《大學》，是研究朱熹時相當重要的材料，由他對於《大學》的重視，以及相關的注解，顯示了他如何實現「內聖外王」理念的重要關鍵；而《四書集注》的出現，象徵了《五經》到《四書》的轉化，這樣新的經典詮釋典範，在在注入了朱熹哲學的意涵，透過其義理化的解釋，為儒家經典改頭換面，也要讓天下的讀書人在無形中潛移默化。哲學思想與經典詮釋，擴大到教育、科舉考試之間的聯結關係，是一體成形，朱熹在宋代的政治環境中，如何一步步實踐其「內聖外王」的理念，其思想及作為的互動脈絡是相當重要的。朱漢民、肖永明著的《宋代《四書》學與理學》考察了過往相關的《四書》與理學研究，指出對於《四書》的重新詮釋、利用、發揮是理學思想體系建構的基礎，也特別針對朱熹《四書集注》的詮解方式思想進行研究，特別指出《四書》在理學家的特別處理下，對於統治集團與士人的傳播與滲透力量。

出版工作是朱熹文教事業的重要一環。宋代出版事業蓬勃，章宏偉《出版文化史論》、周寶榮《宋代出版史研究》、楊玲《宋代出版文化》中，都論述了宋代出版業發達的原因、圖書市場的活躍與獲益、兩宋的刻書系統概況。而朱熹生存

⁴¹ 陸建猷：《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陳志信：《朱熹經學志業的形成與實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陳志信：〈論《四書章句集注》對聖賢授受語境的承繼與開展〉，《政大中文學報》第22期（2014年12月），頁183~214。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陳逢源：〈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東華漢學》第3期（2005年5月），頁223~254。陳逢源：《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陳逢源：《「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3年）。林維杰：《朱熹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年）。李明輝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二）儒學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李明輝編：《儒家經典詮釋方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高荻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解經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7年）。柯玫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研究——以詮釋傳意方法分析》（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7年）。

的南宋時代，福建地區刻書活動興盛，黃怡婷《宋代刊刻集部典籍之研究》也討論了其因。至於朱熹的出版書籍，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已有考證與羅列，方彥壽《朱熹學派與閩台書院刻書的傳承和發展》也針對朱熹在福建刻書的活動進行研究，也討論了其協助出版人物、經營模式等內容，對於理解朱熹的出版工作有所幫助。⁴²

至於宋代教育狀況、朱熹與官學、書院、科舉的研究，有劉伯驥《宋代政教史》、袁征《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苗春德主編《宋代教育》、楊渭生《兩宋文化史》、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論》、《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樊克政《中國書院史》、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李才棟《中國書院研究》、方彥壽《朱熹書院門人考》、孟淑慧《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甯慧如《南宋儒者的入仕與教學——特別關注道學家的雙重實踐》、方旭東〈應舉與修身——道學的身心治療之術〉、比利時學者魏希德《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折沖》、美國學者田浩《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等。⁴³

劉海峰的研究指出，書院教育在南宋時期蔚為風尚，書院往往成為學術活動的中心，也對科舉考試的內容與文風造成影響，⁴⁴可見理學家以書院為中心，確實由自我思想的建構、教育的傳播與科舉考試的作用展現了他們的學術影響力。李兵對與宋代書院發展與興衰過程進行討論，深入分析了書院與政府、官學、科舉制度、讀書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方彥壽《朱熹書院門人考》詳細考證了朱熹建

⁴² 章宏偉：《出版文化史論》（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周寶榮：《宋代出版史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楊玲：《宋代出版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黃怡婷：《宋代刊刻集部典籍之研究》（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方彥壽：《朱熹學派與閩台書院刻書的傳承和發展》（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

⁴³ 劉伯驥：《宋代政教史（下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袁征：《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廣東：廣東高等教育社，1991年）。苗春德主編：《宋代教育》（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楊渭生等著：《兩宋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84~394。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論》（臺北：東昇出版社，1980年）。樊克政：《中國書院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李才棟：《中國書院研究》（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方彥壽：《朱熹書院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劉海峰等著：《中國考試發展史》（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孟淑慧：《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第122冊。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甯慧如：《南宋儒者的入仕與教學——特別關注道學家的雙重實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5年）。方旭東：〈應舉與修身——道學的身心治療之術〉，收於吳震主編：《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74~393。（比利時）魏希德著，胡永光譯：《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折沖》，收於彭國翔主編：《海外中國思想史研究前沿譯叢》（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美）田浩：《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⁴⁴ 見劉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頁198。

造、復興、講學的書院數量與地點，也分別羅列在各個時期、各個書院從學朱熹的學生，是研究朱熹書院情形的有力資料。魏希德在《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折沖》中，針對南宋科舉與儒家學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特別是關於朱熹對與時文、事功學派之古文教學法的意見，可謂理解朱熹文教意識一個較為特別的切入點。孟淑慧全面考查朱熹的教化，從儒家的德治思想到朱熹的理念與實踐，再到朱熹門人的繼承發展，指出朱熹透過教育來化人的濟世熱忱與努力，使朱子學後人秉持相同的精神進行淑世的工作，影響深遠。陳雯怡則全面考查宋代官學到書院的變遷，將兩宋士人在適應科舉制度下，教育思維與方式的轉化，充分展現出來，這對我們考查朱熹集中在書院模式從事教育活動的理解有很大幫助；陳先生也指出，教學志業的崇高成為宋代士人在政治活動之外的一種價值，⁴⁵與筆者的想法不謀而合，而筆者認為，這是在做朱熹「內聖外王」研究時，仍然缺乏完整體系建構或被相應理解的部分，理當在哲學與史料之間，進行更全面而深入的處理。甯慧如在《南宋儒者的入仕與教學——特別關注道學家的雙重實踐》文中，詳述南宋儒者們對於政治與教育的心念與努力，指出南宋儒者雖不仕卻不忘治世的共同傾向，呈現了一種政與教之間的兼顧關係，為朱熹「內聖外王」新型態的政教平衡特色提供了佐證。

最後，朱熹面對鄉里社群與士人社群所進行的文教工作，諸如家禮、鄉約、社倉與士人交流的材料，包含師瓊珮《朱子〈家禮〉對家的理解——以祠堂為探討中心》、張雪紅《傳播與轉型：走向生活世界的宋代社會教化研究》、張經科〈朱熹《家禮》及其《儀禮經傳通解》之〈家禮〉辨異〉、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劉敏《家國之間——從家訓、義莊和鄉約現象看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劉欣《宋代家訓與社會整合研究》、周揚波《宋代士紳結社研究》、翟秀娟《宋代鄉約制度研究——兼與中古英國鄉村共同體比較》、呂建康《宋代鄉約組織社會職能研究》、楊博淳《損有餘補不足：宋朝義倉研究》、梁庚堯〈南宋的社倉〉、《中國社會史》、朱倍儀《宋代士人之義行》、方健《北宋士人交遊錄》、田浩《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朱熹的思維世界》等。⁴⁶

⁴⁵ 見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頁374。

⁴⁶ 師瓊珮：《朱子〈家禮〉對家的理解——以祠堂為探討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碩士論文，2002年）。張雪紅：《傳播與轉型：走向生活世界的宋代社會教化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張經科：〈朱熹《家禮》及其《儀禮經傳通解》之〈家禮〉辨異〉，收於劉昭明主編：《第十一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2014年）。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第2期（2003年10月），頁1~20。劉敏：《家國之間——從家訓、義莊和鄉約現象看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河北：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劉欣：《宋代家訓與社會整合研究》（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周揚波：《宋代士紳結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翟秀娟：《宋代鄉約制度研究——兼與中古英國鄉村共同體比較》（山東：山東師範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呂建康：《宋代鄉約組織社會職能研究》（陝西：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碩士論文，2014年）。楊博淳：《損有餘補不足：宋朝義倉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所碩士論文，2012年）。梁庚堯：〈南宋的社倉〉，

師瓊珮《朱子《家禮》對家的理解－以祠堂為探討中心》、張雪紅《傳播與轉型：走向生活世界的宋代社會教化研究》、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的研究，都能注意到朱子《家禮》適用階層包含了士庶民階層，因此能發見朱熹對與一般士民進行禮儀提點與教化的用心。劉敏《家國之間——從家訓、義莊和鄉約現象看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朱倍儀《宋代士人之義行》兩篇論文皆關注士大夫對於鄉村建設的投入，也能點出土大夫在鄉里間的角色與定位。呂建康《宋代鄉約組織社會職能研究》則強調地方士紳位於政府與鄉村之間的中間地位，並認為士紳在鄉間的種種鄉約、結社活動，隱約反映出他們與政府爭奪自治權與抗衡意圖；筆者則認為，以朱熹而言，鄉約或社倉之義行，並不代表他要與政府爭權或者對抗，只是扮演一居中協調、與政、民上下一體的角色。而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一書，考查了與朱熹有相關的當代學者，如張栻（字欽夫，1133-1180年）、呂祖謙（字伯恭，1137-1181年）等人，對於朱熹與同道儒者間的交流互動的關係，學說的形成與散播過程，都有很大的研究助益。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朱熹的哲學思想透過了《四書集注》呈顯出來，其思想配合新的經典詮釋與出版，經由他致力於官學、書院、精舍、鄉約教育等不斷講學的過程，並結合科舉制度與士人交遊逐漸散播出去，這個力量是不容小覷的，也可以看見他努力實踐「內聖外王」理念的用心。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從儒家的「內聖外王」精神出發，以朱熹作為研究焦點，目的小則在於聯繫朱熹「內聖」之理論建構與「外王」之理念抱負，大則藉此成果呈現思想與歷史之間互動不分的緊密關係，不但要由士人實現「外王」之政治、社會領域回向思想形塑，更要從「內聖」思想理論的意涵體現儒者的濟世關懷。因此一方面要在縱貫的時間軸中尋找朱熹作為儒者所承繼的傳統精神，必然要上溯先秦儒家，以至漢唐兩宋之間「內聖外王」的根由與消長關係，以此確立朱熹的儒家思想定向；一方面將研究時空定於朱熹生活的宋代，考察宋代的政治文化對於儒者有何契機與侷限，並從朱熹的哲學思想輔以史料言論進入，考察其新的「外王」場域，加以體現朱熹「內聖外王」思想的互動關係與實踐努力。討論分三個路徑：一是針對先秦以來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的考察，在思想內涵與流變趨勢中證明儒家精神的趨向，重新定位並考察「內聖外王」一詞應當的使用範疇與轉變過程，此必須拈出歷代「內聖外王」一詞出現的段落，以及能夠呈現各朝「內聖外王」型態的材料。在傳統溯源結束後，也要考察宋代歷史與相關研究，聚焦於社會變

收入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1997年），頁427~473。梁庚堯：《中國社會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朱倍儀：《宋代士人之義行》（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3年）。方健：《北宋士人交遊錄》（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美）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版）》（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

動、制度文化、政治氛圍，以彰顯朱熹所處時空背景對儒者的影響，並要廣泛蒐羅北宋以至朱熹朝時士人的言論與事蹟，呈現宋代「內聖外王」的新型態。二是鎖定於《朱子文集》、《朱子語類》、《四書集注》等朱熹言論，並參考相關朱熹研究，於思想脈絡中尋找朱熹「內聖」與「外王」間的交相共構關係，重整道德與事功的意義範疇；三是針對朱熹的文教事業進行探究，參考王懋竑《朱子年譜》、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朱子大傳》、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之考證成果，⁴⁷對於其學術文教事業之發展過程與繫年進行梳理，掌握朱熹注經、出版書籍、書院建構、從遊講學等相關歷史材料，以見其「內聖外王」的具體實踐。

以下，便依序說明本研究之方法進路與章節規劃，全文分五章，主要內容自第二至四章，由傳統的溯源、當朝的影響，到朱熹的思想與外在作為，各有攸屬，卻又緊密不分：

〈第二章 時空的形塑：儒家修身濟世的精神蘊向〉首要目的在確立朱熹「內聖外王」思想的儒家傳統，但「內聖外王」一詞非出自儒家，經過時代的變遷，在範圍與意義上各有窄狹，只是籠統稱「內聖外王」，不足以看出朱熹之前到朱熹所處之時的細微變化，必須更清楚地對「內聖外王」在不同脈絡下使用的同異做出分析研究，故本章將對此做出梳理：孔孟荀思想中如何體現了「內聖外王」的精神，後世儒者又如何賦予其新的意涵，到了宋儒又是如何繼承與開新，現代學者又怎麼看待，都必須有更詳細的交代，此中包含使用「內聖外王」時的定義問題，並重在呈現各個時代「內聖外王」型態的差異。其次要進入宋代政治文化的討論與考察，呈現宋儒一如朱熹所處的政治形勢。宋代文官輩出，士子備受禮遇，儒家思想大盛，這個時候的儒者具有與其它朝代不同的命運與身份，有更多的機會，也有更多的責任。讀書人雖然有更多的契機與理念，但內部卻有思想理論的紛歧，爭奪權力的競賽也不曾停歇，國是與黨爭的出現，深深影響當朝儒者的命運；外部有科舉制度的限制，儒者必須因應考試以進入權力中心，又要在入朝為官後能落實理念，可說是舉步維艱。但科舉作為讀書人進仕的管道，不但大大影響士人的思想，也成為儒者實現理想的路徑。同時，宋代政治與黨爭在文人之間的分歧，又與各學派之間的學術傾向有密切關聯，但文史哲領域前後經歷了一種體用本末的意識形構與輕重轉移。並且，當時文人對於政治與仕宦的看法也開始有所轉變，呈現一種入朝與不仕之間價值的拉扯。在這樣的環境與氛圍下，宋代儒者承先啟後，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形塑了一個嶄新的文人意識，「內聖外王」的型態自與以往有所不同，而這正深深影響朱熹的想法與學說，亦是本章所欲著力之處。

〈第三章 重整的思維：朱熹內聖外王思想的互動關係〉邁入朱熹哲學的殿堂，欲意挖掘朱熹思想中「內聖外王」思想的連結關係，除了要在朱熹哲學建構

⁴⁷ [清]王懋竑：《朱子年譜》（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中看見環境如何影響思想，也要看見朱熹如何以思想的建構去表達、實現理想。本章以朱熹之「內外」、「本末」、「體用」概念所反映出的兩端關係與原則為基準，針對朱熹對於內在道德與外在事功之間的連結關係，考察其是否存在主從、先後、輕重的順序或取捨；此將借助朱熹與陳亮在義利問題上的討論，進入到道德與事功的關係考察，重整朱熹所謂的功業、事功的指涉範圍，從歷來文人實現「外王」的政治領域中跨越出去，彰顯於文教事業對於實現「外王」的重要意義。同時，正視朱熹對於「文教」的理解與理論基礎，重新定位朱熹的「內聖外王」型態，梳理如何從文化教育事業貫徹內與外、物與我，連結道德與事功。本章也將展現歷來作為朱熹「內聖」修養的哲學理論——理氣論、心性論、工夫論架構，與「外王」事業之間的滲透與互動脈絡，包含朱熹深切認識到的氣質稟賦問題、觀心所導致的認欲為理問題、與現實環境密切結合的格物致知的工夫問題等等。朱熹身處世界、心繫天下的現實性格，將在其道德理論中深切嶄露，也彰顯朱熹欲由「內聖」開「外王」，而「外王」已在「內聖」之中的企圖與面貌。

〈第四章 貫徹的實踐：朱熹社會文教工作的內外結合〉聚焦於朱熹的實際作為，見其對於文教事業的努力，展現其經過重新定向的「外王」實踐。「文教」包含了文書、文化、教育、教化多層次的意涵，故含納朱熹的種種創作、教學活動、鄉里教化工作。此中，朱熹對於《四書》的重新詮解，將自我的哲學理論傾注，創造了新的儒學典範，為經典注入新的生命，透過在官學的教學、書院的經營與出版的進行，進一步影響了廣大的讀書人、甚至一般鄉里社群，也影響了科舉考試，由科舉的限制到順應科舉做出改變，進而反向嵌入制度之中，雙向的關係耐人尋味。內在學術透過注經、出版、教育、講學、士子交流活動，與外在事為也呈現一體不分的交融關係。其對民間社會的關注，包含社倉的設立、鄉約的撰寫、移易風俗的作為，也深切反映其濟世教化理念。政治與文教之間的交互權衡與影響，難分難捨的矛盾關係，也在朱熹的思維中形塑出來，亦是本章欲展現的部分。即使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在傳統的「外王」事功上看似沒有實際的成效，朱熹也在環境的限制下，找到了一條出路，學術文化教育的伏流，隱藏在其「內聖」理論建構的消極面下，開創了積極的意義，透過與環境的互動，朱熹以自己的方式，尋求「內聖外王」的貫徹與統一，這樣的精神與力量不容輕忽。

本研究既然討論環境與思想之間的關係，便不能只偏向某一隅，對於政治文化的時代氛圍重在點出提供儒者行道的環境，不在整體歷史的考究；對於哲學思想的建構部份重在「內聖外王」的連結關係，不在全面的哲學分析；對於文教事業的實踐方面則重在呈現朱熹新的道德事功之學，不在細密的史料羅列。因此，相較於純歷史研究的全面性資料梳理，筆者則集中揀選於與儒者及朱熹密切相關的部分進行討論，並著重於儒者內部意識的特色與轉變；相較於純哲學研究的深入性理論分析，筆者則注重發見歷史環境與思維之間的連結，以及思想中所蘊含的「內聖外王」精神；相較於以既有的「內聖外王」定位與內涵開展研究，筆者

則通過儒者自身來呈現其「內聖外王」的內涵與型態，且重點在描繪朱熹「內聖外王」模式的一體連結關係，也就是指出朱熹通過文教，「即內聖即外王」的獨特意義，而非如傳統研究嚴格去區分「內聖」與「外王」的實際指涉，或是從各個方面去填滿其「內聖」與「外王」的內涵。筆者曾對朱熹的理論建構部份進行考察，但純哲學的研究不是朱熹生命的全部，朱熹曾針對〈大學章句序〉解釋：

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⁴⁸

「明明德」是人為學的基礎，通過漸明此內心光澈明亮的本有德性，便能使道德完滿，但道德的完滿不是修己而已，而是要「志於天下」，為天下付出一己之力，人的「明德」才能夠真的「明」，人的道德才算是真的完滿。朱熹這樣重視「兼善天下」的道德完滿，怎麼可能滿足於「內聖之學」的哲學性建構呢？他仕宦之情不濃厚，對於學術與教育，確實下了很大的心力，其學術研究，也確實體系龐大，自成一格，但這些都無法掩蓋他對於貫徹「內聖外王」的那份心意與努力，他的學術研究，在懷抱著「兼善天下」的理念下，已不純然是學術的興趣，而帶著實現理想的滿腔熱血，就像歷代學者們兢兢業業，對學術事業嘔心瀝血，也從來就不只是一己之滿足，如何透過學術教育的力量對天下人有所貢獻，成為一個潛伏的夢，在這個時刻，我們與家國天下已緊緊相連。那麼通過朱熹思想與歷史環境的交涉中，我們看見朱熹「內聖外王」的精神已然統一起來，也能夠給予我們更多智慧與效法的空間。

⁴⁸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4〈大學一〉（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頁 260。